

论洋务教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贡献

王韵秋

【内容摘要】洋务教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贡献主要表现于：洋务教育奉行的“中体西用”思想确立了近代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构架；其推行新学的结果，加速了旧教育体制的解体，加快了教育近代化的步伐；中译西书冲击和改变了旧的知识结构和教育体系，加速了课程内容一体化的进程；培养了一支近代化的师资队伍，形成了一股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雄劲东风；留学生制度的建立打破了封闭式的教育结构，形成了开放式的教育格局。

【关键词】洋务教育 近代化 中体西用 一体化 开放式教育格局

【中图法分类号】G 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1999)06-0087-05

中国的近代化，大体是指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叶，中国人追求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科学和工业革命的成果而言^①。如果说中国近代化工业文明的话题是在本世纪50年代中叶得到解决的话^②，那么，由追求和学习西方工业文明成果而引发的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运动则无疑是伴随着洋务教育的不断发展而进入到全方位的展开阶段。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与社会近代化一样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历程。教育近代化的出现和形成与洋务教育的产生、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最终完成是以洋务教育的贡献为基础的。

纵观洋务教育的发展史，其间所体现出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近代实科教学思想及对西学课程的实践尝试，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作为一种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或教育学说的产生，必然是一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时代的产物。面对两次鸦片战争后形势的遽变，西方列强的侵华活动全方位的加剧，迫使清王朝“如果不想灭亡的话”，就必须“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国资本主义，虽然与

当时发达的欧美各国无可比拟，但同样需要有以开设科学课程为主的近代教育与之相适应。在此背景下兴起的洋务教育及其学堂，在主观上虽然只是为了挽救王朝危机，但在客观上却正是“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教育领域里某种程度的再现，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它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发展到了较为系统、完善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对早期洋务教育中“变器不变道”思想作了拓宽，而且率先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本着“经世致用”的立场，对传统变易思想的近代化命题的理论核心——“中体西用”作出了实践性尝试^④，在内忧外患的残酷现实下，将西学引入了中国传统教育之中，从而导致了不占主体的西学对中国传统的主体课程结构的冲击和传统教育体制的裂变。洋务派在当时封建专制主义重重设防，顽固势力极其强大的态势下，以创办新式学堂为主阵地，以官方教育的形式为制度保障，以培养社会适用人才为主要目的，以传授自然科学知识为主的实科课程为教学内容，以班级授课制为教学组织形式，在办学目

收稿日期：1999-08-16

的、方向和体制上突破了传统教育的藩篱,使西学最终得到了官方的基本认同,从而为西方的近代物质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一定的合法地位,并就此启动了官方培养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人才的车轮,培养出了一批数量不多但却有别于封建士大夫的知识分子,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乃至社会经济和军事近代化作了铺垫。所以说,洋务教育及其实践活动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和积极意义,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最终完成作出了基础性贡献。

一、洋务教育奉行的“中体西用” 思想确立了近代教育改革的 基本思想构架

一定的教育思想是一定社会的文化思想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洋务教育奉行的“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发展密不可分的。早在鸦片战争前后,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日益加剧,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张际亮等为代表的一批“经世派”学者,基于对现实的忧患意识和“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在士林中掀起了一股研求“实学”,要求变革的新思潮和新学风,开始为当时的现实危机寻找出路。他们以现实和敏锐的眼光及较为开放的文化心态,本着抵抗侵略的爱国精神,正视西方的威胁,了解西方,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要求改革学校教育,在四书五经的教育内容之外,增加以军事技术为核心的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从而首次回应了近代中西文化的撞击之声,为其后的中国近代化指明了航向。其后,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人将中西文化的交融主题进一步引向了当时的教育领域,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先改科举、采西学、制洋器。中西二学要以“中学其本”、“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⑤、“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⑥。采西学是为了“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这些观点随之成为当时各政治流派演绎各自近代化航程的政治行动的着力点。于是,一批满腹经纶的封建官僚士绅便以洋务派自居,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为指导,以“经世致用”的儒家精神为准绳,顶着顽固派的强大压力,举起了“洋务救国”的旗帜,倡导了刺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洋务运动,把学习西方的理论引向了实践,从而导致了一场文化教育领域的变革。洋务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便在这场变革中应运而生。

甲午中日之战后,中国社会危机愈益加重,中国的思想界也悄然跃出了传统的“经世致用”藩篱,中西文化的撞击也跳出了只学习洋人物质文明

的局限,学习“西政”^⑦运动也在蓬勃酝酿,近代中国学校教育的办学媒介亦由洋务派官办实业学堂向个体创办新型普通学堂扩展,维新派人士和民族资本家个人开办近代普通学堂蔚然成风^⑧。在此情况下,作为官方教育的洋务教育如何发展、如何在新形势下主导中国学校教育的方向、如何从思想上制约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如何挽救正在崩溃之中的晚清政体,同时针对甲午战争中显现出来的中国科技落后和人才匮乏问题,如何更好地培养一批为统治层面服务的应用型人才,就成了后期洋务派官僚们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张之洞在总结多年创办洋务学堂的经验的基础上,经过精心思考,完成了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的力作——《劝学篇》,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治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的思想,主张中西会通,“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从而在理论上以官方媒体的形式正式承认了近代各类学堂中的西学课程的合法地位,最终形成了以“中体西用”为核心的洋务教育思想体系。

“中体西用”教育思想承认中西二学相需并存、缺一不可,同时也看到了二者之间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中学为体”确立了中学的根本位置;“西学为用”冲击了传统单一的儒家伦理教育,打破了只读儒家圣贤书的局面,是对早已落后、陈腐的知识结构的一次革命。“中体西用”的思想作为清末统治思想,不仅冲破了封建顽固派视为至上的“旧学”樊笼,并有效地主导了官方政策的修订,而且对中国思想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制度保障作用。这一思想对传统教育在办学方向、办学体制和教学思想、教学内容上的冲击和突破一发而不可收,促使了新式学堂的大量涌现和西学的广泛传播,成为戊戌维新时期废八股、改试策论和兴办大中小学堂的前奏。“中体西用”思想的确立和推行,从某种程度上确保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在中国近代教育中的主体地位,防止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全盘西化,使中国近代教育始终未能脱离“中体西用”的基础构架。

二、洋务教育推行新学的结果, 加速了旧教育体制的解体, 加快了教育近代化的步伐

洋务教育对新学的追求,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使旧式学堂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育制度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受到了重大冲

击。这种变革和冲击首先表现于新式学堂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组织形式、课程设置上。传统的教学内容是经学诗赋,必读课程是四书五经,教学方法是先读后背再听先生解说,考试则是做八股文章,组织形式则是个别教学。洋务教育推行的结果是单一的儒家经学内容被多样化的近代知识所取代,外语和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进入了课堂,而且西学课程比例和时数逐年增加,到了洋务运动后期西学课程总时数要占80%,甚至90%^⑤,致使各学堂的课程从时间安排上来看已具有“西主中辅”的特点,且传统的经学一般不列入正式课程,亦鲜有考核,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所言:“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学堂既以洋务为主义,即以中学为具文。其所定中文课程,不过循例咿唔之事。故学生之视此学,亦同赘疣,义理之学全不讲究,经史掌故不啻屠心。”^⑥大量西学课程的设置,无疑破坏了科举仕途的唯一性,最终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正宗地位。同时,新学堂采用班级授课制,废除了专以做八股文章定优劣的考核制度,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新办法,如船政学堂三月一考的淘汰制及实习制,并且特别重视实践能力。

其次表现于晚清科举取士的标准上,使其从单一的帖括、小楷、考据、词章转向“鼓励新旧学兼通”。李鸿章曾提出将“西学”引入科举考试,认为“中国士大夫沉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要求对传统的科举制度“稍变成法”,变通科举考试功令,并“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⑦,从而“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⑧。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清季废科举前的十余年间,取士的标准已转向“鼓励新旧学兼通”,如光绪十三年(1887年)总理衙门奏准御史陈琬莹的建议,在科举考试中添设算学一科(包括格物测算、机器制造与各国史事在内),成为我国改革科举、废除科举的前奏^⑨。士人所读之书即随之而变,“遂取广学会译著名书,视为枕中鸿宝”,从而导致中国的读书人从孔孟之道转向新学,随之潜意识地修改了中国士人的治学之路,“实学思想”开始逐渐向科举渗透。与此同时,鼓励洋务学堂学生和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并规定洋务学堂的学生若想取得“由科甲出身”的资格,须在参加乡试之前先通过“格物、测算及机器制造、水陆军法、船炮水雷或公法条约、各国史事诸题”^⑩的测试,从而加重了科举考试中新学的力度。洋务学堂的学生及留学生通过科考进入仕途亦局部地改变了晚清官僚集

团的人员结构。

最后表现于教育制度上。20世纪初,清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曾对教育体制进行过几次改革,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作为清末新政^⑪成果之一的“癸卯学制”。该学制的核心是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旨在遏制清末以来开始出现的体现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思潮的新学风,但已开始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癸卯学制”的问世,无疑使洋务运动以来兴办的新式学堂及其教学模式制度化,从而使分科教学的教育模式趋于稳定。同时它还借鉴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学制的经验,按初等、中等和高等三段,实施通人、师范和实业三类学校教育,组成宝塔式结构^⑫,从而使洋务运动以来的分科教学模式更加完善和系统化,最终彻底瓦解了旧式的传统教育制度。尽管洋务教育在当时仍只能作为科举的附庸,旧政权、旧意识仍千方百计阻挠它的发展,然而,它对传统教育在办学体制和方向上的冲击和突破从此而一发不可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下令“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⑬,推行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新学制的颁布,科举制的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划上了一个句号,是中国最重要的体制变动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确立。这不能不说是由于洋务派官僚对封建传统教育制度不断进行重大变革的一个成果。

三、中译西书冲击和改变了旧的知识结构和教育体系,加速了课程内容一体化的进程

随着西学课程设置的日渐规范化,洋务派开始大量创办翻译机构,集中力量译西书,以便有效地服务于洋务教学。当时洋务学堂采用的西学教科书一般来源于两种渠道。一种是学堂自设翻译机构,利用教习和学生翻译西书。如同文馆就是当时著名的译书馆。其译书主要是为了教学所需,同时还免费赠送国内官员。所译西书既包括了社会科学中的法学、经济学、历史、外语等学科(如《万国公法》、《富国策》、《各国史略》、《英文举隅》等),也包括了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化学、天文、历法及医学等学科(如《格物测算》、《化学阐原》、《天学发轫》、《中西合历》、《全体通考》等)。中译西书也是同文馆学生的重要功课之一,其八年毕业诸生,后五年都须译书^⑭。无论教习、学生,凡译书有成者均有奖励。1885年1月有两位教习升授官职,一半是译书甚多之故。另一种渠道是选用其他

翻译馆刊印的一些书籍作为教材。如同文馆曾使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刊印的西书作教材^①。当然由于各洋务学堂规制不一,自聘教习,洋教习又各行其是,自选教材,且其人又不通中文,只能用西语教授,所以翻译西书并未作为通用教材。如上海广方言馆虽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在一起,却没有采用翻译馆所译刻的书来教学^②。尽管如此,洋务大员们仍然热衷于创办翻译馆,较著名的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③、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金陵机器局、开平矿务局等处。各馆皆靠官拨经费和官办设施,组织人员合作,成为洋务运动中译印西书的主要机构。同时一些从事其他洋务活动的洋务知识分子,亦自行翻译西学书籍^④。洋务运动时期官绅阶层自行组织进行的翻译西书活动,是近代以来中国大规模主动引进西学的首次尝试。这些译著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不仅为洋务学堂的西学课程提供了急需的教材,为培养新式人才提供了精神食粮,使洋务学堂的教学内容基本趋于一体,并开始冲击和改变旧知识结构和教育体系,为晚清各类学堂的课程改革提供了成例,而且吻合了世界近代教育课程改革一体化的态势,导致中国的近代化变革问题进入全方位发展阶段。

四、洋务教育培养了一支近代化的师资队伍,形成了一股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雄劲东风

由于洋务教育所体现出的极强的专业性和实用性,率先培养出了一支适应近代化教育改革的基本师资队伍。洋务教育伊始,洋务学堂虽以聘请洋教习为主,但同时也任用中国自己的新型教育人员,如京师同文馆、广东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分别聘任著名算学家李善兰、吴嘉善、刘彝程为其算学教习,他们成为第一批投身于洋务教育的洋务知识分子。随着洋务教育事业的发展,洋务学堂陆续培养出了自己的西学人才,一些毕业生被留在洋务学堂中担任教习,充实师资队伍^⑤,或被调派到其他学堂去担任教习^⑥。虽然在洋务运动期间,由于洋务派官僚缺乏发展近代社会教育的考虑,在狭隘的办学思想指导下,洋务学堂数量有限,发展缓慢,教师队伍总体人数也不多,水平较低,学科偏狭,不能全面承担教学任务^⑦,致使此期间始终未能形成一支独立的新型教师队伍。但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创办的洋务学堂中,绝大多数都有洋务学生出身的人担任教习,故而依然发展起了一支洋务教育事业的基本师资队伍,成为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是留学生教育的实施,为近代教育改革培养了雄厚的西学人才。早期如严复留学毕业

回国后,便被船政学堂聘为教员,李鸿章创设北洋水师学堂时又被聘为总教习、会办、总办达20年之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创办天津俄文馆,严复兼任总办,同年他又支持张元济在北京办通艺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并于次年一度任监督,1912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后改称北京大学校长^⑧。留美国学生王凤喈等九人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毕业后,就被留下“充学堂帮教”^⑨,王凤喈任教八年,直至调派随使欧洲才离开此校。

随后,聘请留学生充任学校教师就成了20世纪初期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中的一项基本话题,从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当时我国师范教育滞后的状况。

五、留学生制度的建立打破了封闭式的教育结构,形成了开放式的教育格局

洋务教育的推行,刺激了我国近代官方留学生教育制度的建立,从而彻底变更了几千年来我国传统的封闭式的教育结构,将中国近代教育从真正意义上引向世界近代教育科学化的轨道。古代中国文明遥遥领先,从来都是周边国家向“天朝上国”派遣留学人员。最典型的便是东邻日本,曾派过大批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到中国学习政治制度、文化知识。中国甚少留学外国之识。近代虽有个别人出国留学,如容闳留美,但仅属个人行为,与政府无涉。洋务运动开始后,洋务派深感新型人才尤其是机器制造、轮船驾驶和军事等方面人才的短缺。然而仅靠洋务学堂自己培养,不仅在数量上、质量上难以满足需要,而且不能“远涉重洋”、“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遍览久习,则本原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为了“集思广益”、“收远大之效”^⑩,洋务大员们决心打破传统,向海外派遣留学人员,由此而开创了洋务官办教育的另一种途径——留学生教育。于是从1872年至1875年,先后选派10岁至16岁的优秀学童120名^⑪分四批,由中国近代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等人带领前往美国留学,其中多数人选学路、矿、工、机等专业。其后,国内部分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也开始有计划地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据统计,自1877年起,由官方先后派出的赴英法等国留学人员达108名^⑫。这批留学生在国外不仅学习自然科学、军事技术,而且由于身处异国,直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沐浴在欧风美雨之中,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回国后多数成为各部门的技术骨干,打破了洋技师独操中国技术大权的一统天下,有的还在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

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如首批留美儿童自 1881 年起陆续回国后,李鸿章按其专长“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①,其中不少人成长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如京张铁路的设计与建筑者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民国初国务总理唐绍仪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留学英法的严复,在维新运动期间为激励国人救亡图存,翻译了大量西学著作,尤其是《天演论》影响甚

大,为唤醒知识界向西方寻求真理起了巨大作用。

早期官派留学生群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嬗变过程中的新兴力量,他们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先导,肩负着西学东渐和华风西被的双重任务,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中的一支同时代其他群体无以比拟的社会变革的力源。故而留学生教育的实施是近代中西文化融汇的主要载体和中国近代教育格局开放化的标志。

- ① 参阅吕达《中国近代课程史论》第 10 页,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 ② 本人以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实现的标志是建国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 ③ 《马恩选集》第 1 卷第 256 页。
- ④ 见拙文《试论传统变易思想对洋务教育的影响》,《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7 年第 6 期。
- ⑤ 《西学》见《晚清文选》第 175 页。
- ⑥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第 321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 ⑦ 西政,张之洞以为是“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统治术;维新派所谓“西政”是指资产阶级民主、君主立宪。本文所指为后一种。
- ⑧ 洋务运动时期维新派开办的典型学堂有上海格致书院和正蒙书院。
- ⑨ 《洋务教育评议》,见《史学月刊》1987 年第 6 期。
- ⑩ 《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一)第 137 页。
- ⑪⑫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4。
- ⑬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 4 册第 791 页。
- ⑭ 《洋务运动》(二)第 209 页。
- ⑮ 清末新政是清廷从 1901 年起陆续实施的政治改革,内容之一是兴办学校,改革官方教育体制。
- ⑯ “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颁布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3 年)。
- ⑰ 《光绪政要》第 27 册 31 卷第 59 页。
- ⑱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 31 页,人民教育出版社。
- ⑲⑳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 ㉑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同文馆成为当时有代表性的二大译书馆,据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记载,自 1871 年开始到 1880 年已刊译书 98 部,235 本。
- ㉒ 容闳在江苏省官署任译员期间,曾翻译《契约论》(派森著)等三本英文书。马建忠在留学法国期间,翻译了《法国海军职要》。徐建寅在使德期间,翻译了《德国议院章程》等三部书。
- ㉓ 有关京师同文馆毕业留校任教之事可参阅《同文馆题名录》第三次,光绪十三年刊,第 4—5 页;第六次,光绪二十二年刊,第 3—5 页。
- ㉔ 参阅《洋务运动》(二)第 146 页。
- ㉕ 洋务教育时期,一些比较主要的学堂和比较主要的学科,往往长期聘请洋教习承担教学,自己的师资则大多数集中在外语、算学以及其他基础性学科上。
- ㉖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 169 页。
- ㉗ 《李肃毅伯奏议》卷 9 第 85 页。
- ㉘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 30 第 38 页。
- ㉙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 32—36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
- ㉚ 参阅董宝良《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第 78—82 页。
- ㉛ 《洋务运动》(八)第 306 页。

作者 王韵秋 西北师范大学马列教学部讲师 兰州 730070

(责任编辑 胡小鹏/校对 古跃 贺平)